

SHEHUIZHUYI ZHENGZHI
JINGJIXUE TANSUO
SHEHUI BIYAO CHANPINLUN
ZHUBIAN YONGWENYUAN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
社会必要产品论

主编●雍文远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导 言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如果从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算起，先后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并经过马克思的革命变革，才从空想变成科学。自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又经过了近七十年之久，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直到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才开始从理论变成现实。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如果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至今不过六十多年。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一门年青的学科。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少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些研究领域甚至被某些僵化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它的理论统治着。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关系通常被理解为是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同志般的互助合作关系，并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一理解，现在看来，是过于简单化了。它忽视了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联合劳动，在物质利益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别和矛盾。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之间，社会

主义企业相互之间，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都有这种情况。只看到同志般的互助合作关系这一主要方面，忽视物质利益上差别和矛盾的另一面，是一种形而上学。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从理论上向人们提供科学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武器的。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一理解，还给人以另一种错觉，似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经建立，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形式都可由此推演出来。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在同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形成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显示出某些差异性。例如，在产品经济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种经济模式；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指导下，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按一定方式结合而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又是另一种经济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实现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差异。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同模式，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当然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一种经济模式，并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从而把社会主义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排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之外，其结果只能使这门学科脱离实际，变成空洞的、干瘪的和僵化的陈旧教条，从而丧失了它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和任务，是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动的客观规律，即阐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怎样产生、发展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但要真正认识其中的规律，并不容易。建国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认识，就

曾经出现过较大的盲目性，走过曲折道路，吃够了折腾的苦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一认识过程，不需要再进行研究了，那也是一种盲目性。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还应包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对稳定性；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和再生产也并不停止。社会主义经济环绕什么核心运转，它的各个领域又怎样运行？具体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有限资源，合理组织生产，包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怎样组织流通，使再生产能够连续不断地进行，并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怎样利用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实现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促使国民经济增长和经济最优化；怎样组织收入的合理分配，保证国民经济在相对平衡和稳定中发展，并尽可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定条件下有规律地运行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能说已经充分了。不致力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事实上也不能很好地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不可能有说服力地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在《资本论》中不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作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吗？！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我们不是空想共产主义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动规律不应脱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 页。

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高度，我们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旦基本完成，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必然趋势。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透彻地分析这一必然趋势。五十年代末期在“左”的错误思潮影响下，在经济政策上，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甚至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提出消灭商品生产，限制价值规律作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主张。恩格斯针对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说过一句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①我们在二十世纪中期，不顾生产发展状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不仅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错误的。特别是在历史上已有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打算直接用国家法令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节生产和分配的教训，我们重犯这种历史错误，就更有必要提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了。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强调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绝不应该走到另一极端，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但弄得不好，也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去利用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法国出现过一些否认上层建筑反作用却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①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

对此，马克思就曾讽刺地说过他们：“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例如，控制宏观经济和搞活微观经济；计划和市场；统一性和灵活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和补充等等，都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辩证关系。把两个对立物看成绝对排斥或者绝对统一，都是形而上学。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避免形而上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原则。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质和量的辩证关系，必须在研究质的基础上研究量的关系和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以往通常注意了从质的方面分析生产关系，却忽视了从量方面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要求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边际分析”、“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法”等有关数量运算的工具就更有用了。运用数学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联系，掌握数量变化的规律，以便利用它来为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和实现经济最优化服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忽视量的研究。马克思对一系列经济范畴，例如对价值、剩余价值等，是既作质的分析，又作量的分析的。他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数量界限，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机器使用之间的不同界限，都具体地作过探讨；在揭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在研究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中，他高度概括地使用了投入产出法，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持续五年的运算。马克思实际上还使用过“边际”的概念，他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 $c + \Delta c$ 同增加 Δc 以前的资本 c 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① 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投资的边际利润为零，甚至为负数时，资本的绝对过剩就发生了。马克思还说过：“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之后，才算达到了更完善的地步。”^② 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和观点，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否适用呢？我们认为是完全适用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停留在经济现象描述的水平上，那就说明这门学科还很不成熟。我们要真正进入科学大门就必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此形成概念或范畴。在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已提出过不少经济范畴^③。但是，对一些范畴的含义仍颇多争论；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主体经济范畴和基本经济范畴，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束缚在苏联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子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特别是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经济范畴，缺少较深入的研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也就是这一门学科从何处开始陈述的问题，不少同志同意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最简单、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开始。不这样，就不能做到以简驭繁，不能对多层次中的复杂问题和矛盾的各个侧面进行合乎逻辑的有层次的分析。如果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0页。

②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2—73页。

③ 苏联N·C·舍夫佐夫在一本叫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著作中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104个范畴，25条规律。

能在认识和陈述问题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从一般上升到特殊，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复杂而具体的整体，在我们思维中复制和再现出来。

有人对从抽象范畴开始，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其实，所谓抽象，只是把本来存在于客观事物和关系中具有一般性或共同性的东西，用抽象的思维形式反映出来。科学的抽象，只会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因此，从抽象范畴开始，也就是从反映客观事物或关系的比较一般的简单的范畴开始，并不是从什么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开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这一抽象范畴开始分析，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实际上呢？它从理论上再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历史，达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就是很好的说明。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过渡时期开始，从革命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对不同类型的私人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也就是说，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活动的起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现在看来，过渡时期作为始点，主要是描述一些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理论经济学的对象。

可否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制作作为始点范畴？赞成这个主张的理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经济最本质的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内容，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不以生产资料公制作作为始点范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说不清楚。

以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为其基本内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所有制关系要通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过程才能实现

它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关系又只能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而要从生产关系的总和方面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只能是在分析经济运动过程以后，而不能在这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就是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开始，就是要从先对经济运动过程进行分析以后才可能理解的结果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分析的结果作为分析的起点。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在自相矛盾中找起点的困境：一方面，我们的分析要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开始，因为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不能从它开始，因为它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我们认为，不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制作作为始点范畴，并不排斥把它的存在作为分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点范畴的既定前提。当开始提出这个前提时，我们当然不可能详细分析它；但既然不把它作为始点范畴，我们也不需要对它详加分析，只要求对它的基本内涵作一些简单规定就可以了。至于它如何实现自己以及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丰富内容，则只能随着经济分析的展开而逐步得到阐明。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因而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在一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细胞，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寻找一种经济细胞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就是应该寻找一种比较抽象和简单的经济范畴，作为我们分析和陈述问题的起点；而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企业，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生产、流通和分配无不齐备，它所包含的经济关系既较为具体而又复杂。如果把社会主义企业看作是经济细胞，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那末，我们一开始就不得不去研究和陈述那些较为具体而又复杂的经济关系，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有人认为，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普遍形式，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因为计划性虽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普遍形式，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点，但这同它是否适宜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是要在某种物质财富的一定社会形式上反映出来；而我们在分析物质财富的社会形式时，应采用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以，作为政治经济学始点范畴，应该是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而计划性不符合这个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性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互为对应的范畴。计划性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正如生产无政府状态未能成为《资本论》的始点范畴的道理一样。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劳动产品，即社会主义商品，作为始点范畴，是较为适当的。正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不是商品以外，其他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都是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开始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马克思的这个论点，没有理由说它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亿万次的关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

——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并分析了这些矛盾自始至终的发展。“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①列宁的以上论点，对怎样选择始点范畴，怎样以它为起点展开矛盾的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它为我们取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提供了重要启示。

资金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经济范畴，是至今研究仍然很不充分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资金为不同范围的劳动联合体所公有，是用来生产为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的价值，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社会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资金的职能体现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和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主体经济范畴资金本身，应看到他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我们必须重视对资金的研究，把它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提高到好比资本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一样。

有人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主体经济范畴和基本经济范畴三者，说成是相同的范畴，这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不同于始点范畴和主体经济范畴，它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某一特殊成果相联系，最集中地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因此，它又必然地要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不能抽象地从议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来求得答案。把斯大林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中所谈到的“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一目的，说成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和运转的核心，虽然没有什么错，但这种认识不能认为是充分的。这正如抽象地说封建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_{满足}地主阶级的穷奢极欲，而未能提出地租这个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范畴；谈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_{满足}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贪欲，而没有提出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范畴；同样，如果我们只是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_{最大限度}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没有找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或它们的经济运转核心。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只能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去寻找，因为任何经济关系都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而物质利益关系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它总是要集中地首先表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表现在对这个过程的生产成果（或其中某一部分）的追逐和占有上。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都只有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之后才能明确起来。马克思正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后才得出结论说：这一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①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以后又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成果进行了客观分析以后，才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范畴和经济运转核心，才发现了这个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这在方法论上对我们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679页。

有很大启示的。

社会总产品 ($c + v + m$) 据说是用来全面满足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源泉, 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总产品中 c 那一部分必须扣除, 用作补偿基金, 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只有在作了这种扣除以后剩下来的那部分净产品或国民收入 ($v + m$), 才能成为全面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源泉。从根本上说, 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的物质利益的, 只能是净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加。

也有人认为, 仍象以往的私有制社会那样, 只有社会总产品中的剩余产品 (m), 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和经济运转的核心。我们认为, 不管把剩余产品另叫做什么名称, 这个理论都很难成立, 因为它把用来满足直接生产领域中劳动者生活需要的那部分产品 (v) 的生产, 排除在社会主义生产视野之外了。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其他对抗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别。

我们认为,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或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 只能是社会总产品中扣除 c 以后的那部分产品 ($v + m$)。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的这部分产品, 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必要产品。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全部劳动尽管仍可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新创造出来的这部分产品也可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 但是, 它们的意义不同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它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 都是必要的。社会必要产品这一新的经济范畴的出现, 反映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人们进行生产不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凭借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 去占有剩余产品 (m), 而是劳动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去共同占有全部净产品 ($v + m$)。这意味着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 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产生

了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所以社会必要产品才能够又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正因为“社会必要产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处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它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范畴，所以我们把本书题名为《社会必要产品论》。

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主体经济范畴和基本经济范畴，就为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本书中试图就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进行探索。

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章从社会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社会主义劳动产品或者说社会主义商品开始我们的分析；说明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雇佣劳动转化为联合劳动而产生的。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产品的分析，着重说明它具有某些直接社会属性，揭示社会生产关系这一革命变革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进一步的分析将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以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联合劳动等因素加进来考虑，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产品仍然是商品。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地方是，它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生产的商品。明确社会主义劳动产品这一性质十分重要，它是领会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把钥匙，是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接下去，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职能，分析货币怎样转化为资金，说明资金运动根本不同于资本流通。以上三章实际上构成了本书的总论。

为了探索怎样才能以较少劳动耗费，生产更多的适合需要的有用产品，接着我们进入生产过程的研究。

我们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发现社会必要产品这一基本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转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它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范畴剩余价值比较，无论就量上或质上来说，都是不同的。社会必要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以后的分析，将依据社会必要产品这一经济运转核心展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就其实质来说是社会必要产品的生产；同样，流通、分配和消费是对社会必要产品的流通、分配和消费。

在分析社会必要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将在第六至第十一章中，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分别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需要、计划生产、经济效益、技术进步、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经济地位和职能、生产力配置和经济区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在进一步分析社会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中，我们将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着扩大再生产，劳动性质和生产关系将出现部分质变，并展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逐步过渡的因素日益增长的必然趋势。

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之后，我们面临着一个必须作出的选择：应先研究流通，还是先研究分配？我们认为，在研究了生产之后紧接着有必要把流通（即连续的交换，或从总体上看交换）的环节加进来分析，因为社会必要产品作为商品即使已经生产出来，它仍然有一个实现的问题。

过去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统治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已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生产只是社会产品使用价值的生产，社会主义分配实质上是产品的实物分配，流通没有它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早已否定了这种看法之后，却仍然被

认为社会主义商品在不同程度上仅具有商品的外壳而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在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下,资金循环、资金周转和经济运动过程的时间观念,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占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思想,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之后,就在第十二至第十四章中把流通引进来,同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并结合研究资金的循环与周转,分析社会必要产品在生产和流通中的有关问题。

为了提高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效益,有必要结合对经济核算进行研究,同时对国营企业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经营模式进行探讨。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企业有没有活力的重要问题。

再下去,我们在第十五至第十八各章中将转到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社会资金的再生产和流通,主要是研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自觉运用这一规律中的许多问题。例如,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优化,怎样实现计划化和综合平衡,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如何正确运用市场机制和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等问题。社会主义各国建设的实践,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代所不曾有过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计划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它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自然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在研究了生产和流通以后,我们将转入对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探讨。

社会主义分配,是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补偿基金(c)的扣除以后,对社会必要产品($v+m$)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社会必要产品分为个人必要产品(v)和公共必要产品(m)两个部分,我们将在第十九至第二十四各章中,分别研究这两个部分怎样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探讨在分配和再分配中如何利用经济杠杆的调节

机制问题。

在第二十五章我们将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费。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理应占有重要地位。

在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各章中我们将就对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同时研究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规律，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中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在第二十九至三十章中，我们将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探索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性，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在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各章中，我们还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希望它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能起一些鉴往知来的有益作用。

从总的方面看，我们这本书的理论体系，是考虑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和任务的特点，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以始点范畴、主体经济范畴和基本经济范畴为理论核心，以再生产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作框架，建立起来的。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按再生产四个环节安排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家所使用过的四分法。其实，这是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所产生的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分别研究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本身；反对的只是庸俗经济学家把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彼此割裂开来，不承认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真正反对的是他们把生产制度归结为由自然规律所决定，人们无法改变，而分配制度则是可以任意由人们支配和改善等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观点。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